

YANAN CHUBAN DE GUANGHUI

延安出版的光辉

——《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续编

赵晓恩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桐谷出国，相奇等送至码头送行



相奇等七君子出獄後，與杜重遠會見愛國老人馬相伯。



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受屈被监禁时摄。

代 序

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

——写在《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续编出版之际

(一)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历史由此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中国的革命出版事业，伴随着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进步的书报刊配合武装斗争，以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批判为武器批判开辟道路，成为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团结、进步和统一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建国前人民出版事业的继续和发展。饮水思源，不可忘记过去；研究历史，才能开创未来。要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

(二)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在报刊上发表过，结集时对其一部分文章补充资料作了修改。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扼要地记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

驻在延安领导和指点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开展出版宣教工作。这一工作的特点是，把根据地的革命出版工作和国统区的革命出版工作结合起来，以各种方式互相策应，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干部和广大人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铸造时代精神，对于全国的抗日和民主运动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

二是探究有国统区出版模范之称的邹韬奋及其主持下的生活书店的经营之道和斗争艺术。如把握正确的出版方向，坚持质量第一及其履行职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大力倡导创新促发展，民主管理和努力提高干部素质，竭诚为读者服务等优良工作作风。还有那在白色恐怖下采取的斗争策略，使书店保存下来，并做出卓越贡献的成功经验。其中揭示了30年代、40年代革命的新的出版业战胜了旧的出版业而崛起，在群众中扎下了根，是它的力量之源的所在。

三是为中国革命出版史留下了一些文化战士的身影。他们拥护共产党、紧跟共产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并肩战斗，感人的事迹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

四是对建国后的出版工作所作的努力和提出的一些改进意见。

(三)

读者从这本书提供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出版工作作为不可缺少的战斗武器和其存在价值，有助于对人

民出版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就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而言，无论对于干部的思想理论建设，还是出版业务建设，都有可供借鉴和参考之处，它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

2001年10月30日病中



赵晓恩（1914—2001.11.11）出版家。浙江上虞人。1935年考入上海生活书店当练习生，后任总管理处推广课主任。曾任香港《华商报》出版部主任、桂林文化供应社工农业部主任、代理总经理等职。建国后，先后在新华书店、人民出版社、文化学院、国家出版局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等职，1982年离休。晚年勤于出版史著述。

主编有《出版业务知识》和《出版企业管理概论》，参与编撰《出版词典》、《生活书店史稿》。著有出版回忆录文集《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本书《延安出版的光辉》是《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一书的续编。

目 录

代 序	(1)
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 (1936—1947)	(1)
一、延安成为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	(3)
二、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区域发展出版事业的 崭新道路	(5)
三、出版、印刷、发行事业机构的创建及发展沿革	(7)
四、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 出版活动	(16)
五、把发行工作健全起来	(23)
六、协同和支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开展 出版发行工作	(29)
七、巩固和扩大国统区的出版发行阵地	(56)
结束语	(65)
附录：延安出版的报刊和图书一览	(71)
生活书店的经营之道和斗争艺术	(86)
第一编 竭诚为读者服务	(87)
一、应时代需要在抗日烽火中崛起	(87)
二、特殊环境里经营出版的谋略	(88)
三、团结作者共同开拓新文化出版事业	(90)
四、为人民大众服务是唯一的宗旨	(94)
第二编 按企业原则经营	(98)
五、有计划地出书，坚持质量第一	(98)
六、按企业原则组织生产	(100)

七、出版资金的筹集和运用·····	(105)
八、开创书刊发行的新格局·····	(108)
九、独树一帜的宣传推广工作·····	(114)
第三编 确保生存和发展·····	(118)
十、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	(118)
十一、因地制宜的出版发展方略·····	(120)
十二、发挥出版统战工作的作用·····	(134)
十三、三店从地区性合作到全面合并统一经营·····	(137)
第四编 最关键的是领导·····	(140)
十四、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党员起关键作用·····	(140)
十五、“生活”精神面面观 ·····	(143)
结束语·····	(145)
邹韬奋与抗日救国报刊 ·····	(151)
人品与书品——纪念邹韬奋诞辰百周年 ·····	(165)
永远的怀念——邹韬奋先生逝世 55 周年纪念 ·····	(167)
中共的亲密战友杜重远 ·····	(170)
胡愈之抗战时期在桂林 ·····	(184)
陈劭先对桂林文化城的贡献 ·····	(190)
在香港新闻出版战线上的工作片断 ·····	(197)
难忘的岁月——拨乱反正时期的出版计划财务工作 ···	(209)
发展地区性图书批发中心——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	
一个趋势·····	(214)
如何看待出版社自办发行 ·····	(218)
附录：《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目录 ·····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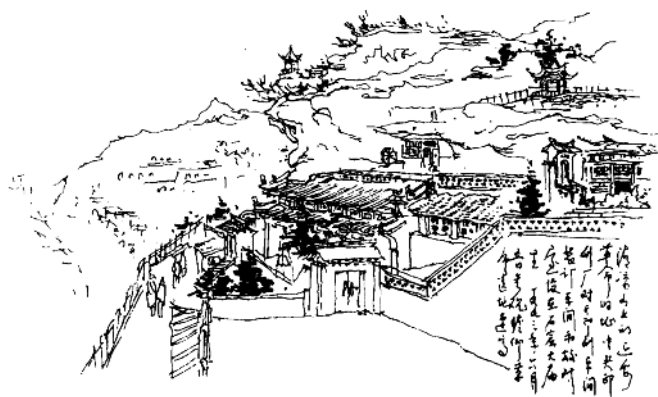
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

(1936—1947)

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是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出版工作的继续和发展。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出版工作与当时的政治风云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它以传播真理唤醒民众为己任，红星照耀中国，对全国的抗日和民主运动都发挥了历史性的促进作用。陈毅同志有诗云，“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①

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工作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出版工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如干部的交流，业务上的配合与协作，互相翻印出版物，不但有政治影响，而且国统区大后方有些革命出版物的原稿也是来自延安（如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丛书》为周扬、艾思奇在延安组稿编辑的，还有丁玲主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也是这样）。这种互相促进的状况，不能不联系到大革

^① 清凉山是指延安，指中共中央。延安的清凉山，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当年他们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发展党的无产阶级新闻出版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那里建有“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纪念馆”。



延安中央印刷厂旧址（速写） 陆本瑞



延安新华书店旧址（速写） 陆本瑞

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它创办的报刊和书店虽在国统区不能公开存在，但是党的出版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以各种方式出版书刊与反动派作思想文化斗争。另一方面，从土地革命时期起，就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出版报刊和书籍，建立起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基础。这两方面的斗争实践造就了一支从事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骨干队伍。所有这些积累和准备，为抗战后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大发展，以至建设新中国出版事业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

延安作为革命文化中心，引导着革命文化发展的方向，在我国现代革命文化出版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根据现有资料梳理其发展轨迹，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扬革命文化出版传统，让延安精神万古流传。

一、延安成为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在我国长驱直入，使我国土沦丧，又加内战不休，民生涂炭，所以中国共产党呼吁团结御侮，挽救民族危亡，正合乎人民公意，是人民的共同追求和企盼。

1934年10月，党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北上抗日，行程25000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及先期到达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从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

1936年，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驻陕北根据地周边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与工农红军实现停战，共同抗日。而蒋介石却继续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亲临西安督阵，张、杨两将军犯颜劝谏，蒋不听，反而胁迫张、杨继续

“剿共”。由此引发12月12日“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代表（周恩来等）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积极工作，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转折，反映了民族的觉醒，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抗日战争就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七七”全面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派出代表先后在国统区大后方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太原、长沙、韶关、桂林、贵阳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和各方面进行沟通，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党中央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为团结御侮鼓与呼的那份热忱和弘扬民族正气的精神境界，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戴和支持，全国人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视延安为革命圣地。毛主席在党的“七大”讲话中说：“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地方，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延安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加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到延安学习，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延安荟萃了大批志士仁人、专家学者，共同致力于发展文教事业，成立了各个门类的学术文化研究会和社会团体，又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延安大学等许多干部学校，培养各方面的英才，造就中坚力量，以支持抗日和民主运动。

二、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区域发展出版事业的崭新道路

毛泽东到延安后说：“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

延安的出版事业是在大力推动革命文教建设中应运而生。如果没有革命文化的大发展，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出版工作。出版活动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开展文教工作的基础。“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地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任务”。（见《张闻天选集》309页）毛主席除了指挥战争，极大地关注着新闻出版工作，并且亲自参与此项工作，因为这也是一条重要战线，文武两条战线一起抓。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的政治形势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国共联合对日抗战的转变中。毛主席指出：“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培养干部，成为重要的一环。”这里有一个政治路线和围绕政治路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转变问题。应使同志们明白了解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为了把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和马列主义理论传播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大后方去，要求重建党的新闻出版机构自有其紧迫感。因为显而易见，通过出版宣传，对引导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了对外宣传，“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见《论持久战》）。

在延安发展出版事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能得到更多的请示报告的机会和可能。

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亲自执笔著书立说，各研究单位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出版物，其中有不少反映国家和民族学术、艺术水平的精神文化产品。在延安有不少学校，读者众多。单是能看书的干部就有一万多人，而且这些干部大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对他们来说，读书看报同吃饭一样都是生活的必需。

但搞出版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环境和条件。这方面在延安有局限性，主要是缺乏纸张和印刷条件。此外，还有一个交通运输问题。对此，党中央责成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努力创造和改善出版条件。党在延安的出版事业，经历了一个艰苦创业、从无到有、变弱为强的发展过程。

事实表明，党中央对全国的革命新闻出版工作是有全盘考虑和合理安排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行调整。如到达陕北后，首先复刊《斗争》杂志和《红色中华报》，继后，国共合作抗日开始了，便把《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1937年创办《解放》周刊，1941年变《新中华报》为《解放日报》；在国统区，1937年12月11日创建《群众》周刊，1938年1月11日出版《新华日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延安以解放社名义出书的同时，在武汉设立中国出版社，重庆新华日报馆也出书，对桂林、香港的出版工作也有安排；随后又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和分局出版的机关报，其中还有《新华日报》华中版（苏皖边区）、《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晋绥边区）、《大众日报》（山东根据地）、《江淮日报》（华中根据地），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宣传网络，相互呼应，共同促进，以扩大党的影响，教育广大群众，壮大革命队伍。

三、出版、印刷、发行事业机构的创建及发展沿革

甲、组建编译出版机构

延安的出版事业机构，从党中央于1936年5月在瓦窑堡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1937年4月创办党中央机关刊《解放》周刊起，到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为止的12年间，随工作发展和形势变化，几经调整，可分为三个时期，大致情况如下：

1.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时期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由张闻天（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秦邦宪（博古）、吴亮平、李维汉、凯丰、陆定一、王稼祥等组成。张闻天任《解放》周刊主编，杨松、吴亮平（吴黎平）、陈昌浩任编辑（据《张闻天年谱》上卷329页记载）。毛齐华、廖承志、徐冰先后任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内设资料（出版）科、发行科，由黄植、涂国林分任科长。中央党报委员会对外的名称为解放周刊社，《解放》周刊用新华书局（二十期起改称新华书店）的名义发行。随后出书就用解放社这一名称。在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在汉口有一解放出版社，当事人声称为同人组织，与延安解放周刊社并无关系。不久该社宣告结束，所出版的“真理小丛书”六种，其中两种绝版（一为王明著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二为该社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另四种版权转让给新成立的扬子江出版社（见汉口新华日报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七日刊出的汉口解放出版社、扬子江出版社的启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此在1938年2月4日出版的《解放》周刊31期上面刊登有以下的声明：

“自民国廿七年三月八日起，凡关于本党文件，本党领导人之著作和言论，以及关于本党的历史材料及领导人传记等，均请托中国出版社及延安解放社印行。前此各书店所出版之与本党上述各问题有关之书籍小册等，除延安解放社出版者及曾经本党负

责人签字交付个别书局印行之个别小册子外，中共中央绝不负任何责任。”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第八路军）总司令部也有过同样的启事：

“近来市上发现各种关于本军过去及现在的小册子和书籍，以及关于本军负责人之著作言论或传记等，事先均未曾征求本军负责机关或负责人之同意和审阅。今特郑重声明，此后上述各类书籍小册等，本总司令部概委托中国出版社及延安解放社印行，其他书局前此及今后未得本总司令部或其负责人之同意所刊行之上述各类书籍小册等，本军概不负任何责任。”

这是为了防止在国民党统治区乱编乱印上述各类图书，以免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所采取的的必要措施。声明中所说的中国出版社设在汉口，由长江局领导（后面还要提到再加说明）。

解放社承担由马列学院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的出版任务。马列学院（后改中央研究院）于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张闻天兼任院长。该院设立了一个编译部从事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张闻天又兼编译部主任（张仲实1940年从新疆来延安后接任编译部主任），亲自抓此项工程。在院从事编译工作的，先后有王学文（副院长）、柯柏年、何锡麟、王实味（王实味）、景林、赵飞克等人。此外，还有成仿吾、艾思奇、徐冰、吴黎平、陈昌浩等参与工作。所据版本，有俄文或德、英、法、日文本，也有一些是翻印国内已有的中译本和莫斯科出版的中文本，经校订后印行的。

党中央军委另设有编译处（后改编译局），从事翻译恩格斯等人和苏联的军事著作。叶剑英亲自指导，曾涌泉、曹汀、焦敏之等人从事翻译工作。军委总政设有八路军印刷厂，用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名义出版军事书籍，自成系统。

1942年毛泽东建议在整风后成立一个大编译部，大批翻译